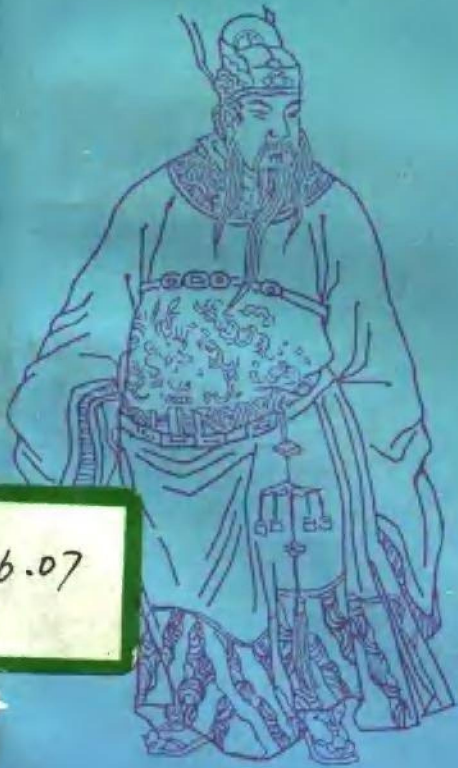


戚文 陈宁宁著

青梅煮酒

遍英雄



36.07

戚文 陈宁宁著

青梅煮酒

英雄

责任编辑 彭卫国

封面设计 王晓阳

青梅煮酒论英雄

——三国时代的人物和韬略

戚文 陈宁宁 著

*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福州路 401 号)

兵书专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丹阳新华印刷厂排印

*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25 字数 220 千字

1994 年 4 月第一版 1994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ISBN 7-80569-900-5/G·101

定价：8.00 元

沪新登字 119 号

三国时底英雄，智术
武勇，非常动人。

鲁迅：《中国小说历史的变迁》

序

戚文先生与陈宁宁女士合著的《青梅煮酒论英雄》是一部“三国人物论”专著。文笔流畅，生动活泼，可读性强，而其内容也很新颖，其中有若干分析和论断是很精辟的，就是某些不够妥当的分析和论断，因问题的提法和分析的新颖，也会使细心的读者得到有益的启发。

第一篇《张角、张鲁和早期道教的历史作用》，浓笔重抹，生动地描绘了声势浩大、席卷全国的黄巾大起义，把张角和张鲁作为英雄人物予以分析和评价。作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黄巾起义，“既是对东汉旧的腐败统治体制和统治思想的否定，给三国鼎立创立了前提，也是达到新的统一的过渡。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三国的历史是黄巾开创的。”无疑，这是一个正确的深刻的判断。无论编年史家把哪一年算作三国时期的开始，而历史的转换，确是从黄巾大起义开始的；是黄巾起义实际上结束了东汉王朝的寿命。旧的一套统治制度、统治办法、统治思想不行了，迫使统治者不得不另辟途径，转换统治机制；事实上不仅地方武装割据，而且中央政权也很快落到了曹操集团手里，刘家的皇帝已经是虚有其名了。正是黄巾起义揭开了历史的新的一章。在中国，不了解农民，不了解农民思想，不了解农民起义，就不了解历史——政治史、经济史与思想发展史。还在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开始确立过程中的战国，就有农家许行学派主张君主“与民并耕而食”，反对“厉民而食”，并在滕国几个村庄实行平均主义的试验。统一的封建大帝国秦王朝确立不久就

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结束了秦朝的寿命。此后，就是在封建社会的上行阶段，农民战争也是一浪高过一浪，其下行阶段更是如此；绝大多数封建王朝都是由农民战争摧毁，而后由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改变统治政策建立起新的王朝。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这样循环往复地向前发展的。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是农民战争第三次大浪潮，它是三国历史的序幕；戚著把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作为“三国人物论”的开篇之作，这是非常得体的。

这部“三国人物论”，对鼎立三方的主要军政人物，都用比较详尽的史料进行了勾画叙述和分析评论。勾画叙述扼要，分析评论有据。依笔者看来，写得最好的是“刘备论”（《从平民崛起的皇帝刘备》）与“孙权论”（《生子当如孙仲谋》）。很多人认为刘备、孙权不过是平庸之辈，这固然同受《三国演义》的影响有关；但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对有关的传记材料没有认真研究，没有“更上一层楼”，站在更高的角度评价作为君主的领导人物。作者把刘备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组织家来看待，刘备善于团结和使用人材，他宽容大度，善于同将领谋士推心置腹、建立友谊，并且信任到底，从不猜疑。所以跟刘备一齐起事的以及后来招致和任用的文官武将，除了个别的例外（如刘封、糜芳），都是终生忠于刘备集团的政治事业，为之用尽力量。就说刘备对待诸葛亮吧，以赫赫有名的刘皇叔（虽在困难时期）而虚心向一个二十多岁的一介书生诸葛亮至诚求教，“三顾茅庐”，言听计从，给以军政、大权而不疑。这是卓越的政治家的大手笔、大才干。诸葛亮的“隆中对”是杰出的，刘备能欣然接受、付诸施行也是杰出的——前者的杰出，是作为战略思想家的杰出；后者的杰出，是作为政治家、政治领导人的杰出。对于刘备的缺陷，作者也作了分析，主要是不谙军事，晚年感情用事，一意孤行大举伐吴，深入敌境、连营百里，被陆逊一把火烧得大败而逃，使蜀汉元气大伤。作者对于孙权也是从政治领导人的角度进行分析与评论的。前人已经指出：“观孙权君臣之间，推诚相待，谗间不行于其间，所以能保江东也”（胡三省）；“孙权之养士也，倾心竭思，以

求其死”(孙盛)“三国人物论”的作者运用具体的资料进行分析论证;并且分析了他的晚年,指出:“晚年的孙权,虽然有近小人、远君子的昏瞶行为。但只要真正明白自己的过失以后,还是能与臣属推诚相待,不自护其短。”作为一个封建君主,特别是坐稳了君主宝座的封建君主,能够不护己短,确是难能可贵的。——刘备、孙权的政治领导的本领,是应该加以扬弃,古为今用,吸收到领导学中去的。

对诸葛亮(《诸葛大名垂宇宙》),以及魏延《魏延的悲惨命运》,对曹操(《曹操的雄才大略和奸诈诡秘》)以及《曹操、刘备、孙权在赤壁的角逐》等四篇),对鲁肃(《大政治家鲁肃》)以及陆逊(《夷陵之战中的陆逊》)等军政人物的分析、评述也是比较好的。多数评论,以人物的性格作为一个集中点进行分析,接触到人物的心理状态,这也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特色。对于诸葛亮一生的政治生涯、军事生涯都作了若干引人入胜的分析。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就诸葛亮的《隆中对》,作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隐居乡间,过着耕读生活的诸葛亮,能为当时亲自参加政治、军事斗争实践的刘备分析天下形势,提出三分天下,联吴抗曹的战略对策呢?这难道不违背认识依赖社会实践的基本观点吗?”问题提得好,提得尖锐。正确地提出问题,就为正确的回答问题开辟了道路。作者从接受间接经验和接受前人来自社会实践的书本知识、理论知识进行了分析,虽然是初步的,但也是值得称道的成绩。如果能够进一步从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的辩证法、理论与实践的辩证法进行分析,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以实践为基础、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过程的认识论及其同经验主义的对立的角度进行分析,就更好了,就更能帮助人们提高思想了。对于曹操,关于他的乘机平定李傕、郭汜之乱、迁都许昌而掌握中央政权,对于他平定北方,特别是官渡之战都作了比较好的分析,对曹操在赤壁之战的错误也从军事上乃至曹操的性格作了分析。缺点是对曹操赤壁之战这个大战略错误的后果估计不足,实际上“赤壁之战”使曹操失去了统一天下的一

个大好机会；接着他又失去另一个统一天下的机会——没有抢在刘备前头进军汉中巴蜀，于是三国鼎立成了定局，难以在短时期内实行统一了。掌握政权的领袖人物影响历史可以如此之大，这并不违背历史唯物论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历史规律是有弹性的，并不是像精制钟表的时针那样。历史唯物论是辩证的决定论，不是机械的决定论——机械的历史决定论是不能对抗和战胜非历史决定论的。戚著对其他若干三国英雄人物也都作了评述，其中不乏独到之见，不必在此一一评介了。

从总体上看这本“三国人物论”的美中不足有二：一是有若干比较重要的人物，如蜀汉的黄忠、马超及其他蜀中新秀，如孙吴的吕蒙、阚泽和薛综，如曹魏的夏侯渊、曹仁、张郃与郭嘉、荀彧，又如平定北方之战中与曹操抗衡的袁绍、吕布以及他们的将领谋士，魏蜀吴三国的文人名士等等，都没有或没有专题论述，这些人在三国历史上都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重要作用。二是缺少“三国人物总观”，如果把个别人物的分析光聚集起来，当可更清晰地照明这段历史。譬如，如果有一篇《三国魏蜀吴武将谋士综录》、《三国魏蜀吴文人名士综录》（对他们的著作也略作分析），就立即可以看出曹操占据的中原人才济济，文化发达，而蜀吴则大为落后，由此更可证明曹操本有统一天下的优越条件，只是由于两次战略性大错误，终于失掉了统一天下的机会；由此也可以证明诸葛亮北伐，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战略进军，是绝然没有胜利的可能的。胜利的唯一可能是利用曹魏内部不稳的机会轻兵奇袭，占领长安，再图东进……所以魏延以二千人偷越子午谷奇袭长安的建议，是有取得胜利的可能的。……经过对若干有关人物（虽然就其作用说来可能是次一等的）的分析，之后写“再论曹操”、“再论诸葛亮……也就能够更加深入和全面了。——希望作者再写一本《青梅煮酒论英雄》续篇，那会在“三国人物论”的总体上上一个新台阶。

人类的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研究历史当然必然研究人、研究人的行为及其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有一条基本原

理叫作“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个命题本身就包含着群众领袖和杰出人物的巨大作用。“蛇无头不行，鸟无头不飞”，群众没有领袖是不行的（固然在群众的行动中必然产生出自己的领袖），领袖和杰出人物的能力与品德对于历史的影响是至深且巨的（固然领袖和杰出人物的能力品德也受历史的群众觉悟水平的制约）；当然，领袖和杰出人物脱离了人民群众也就终止其领袖和杰出人物的作用，终止其创造历史的作用。因此研究历史必须研究领袖和杰出人物，即英雄人物，从研究英雄人物中发现具体的历史辩证法，从而阐明历史，并丰富历史唯物论。戚君这本《青梅煮酒论英雄》，如果对三国英雄人物的研究或其他历史时期的英雄人物的研究有所推动，那也是一个积极的贡献。

古 槐

1993年11月

目 录

序.....	1
张角、张鲁和早期道教的历史作用	1
曹操的雄才大略和奸诈诡秘.....	14
曹操和他的智囊团.....	28
官渡对垒话袁、曹	49
司马懿的事业和性格.....	71
曹操、刘备、孙权的赤壁角逐.....	80
“生子当如孙仲谋”	103
大政治家鲁肃	119
从平民中崛起的皇帝刘备	128
诸葛大名垂宇宙	142
关羽散论	163
夷陵之战中的陆逊	174
三国斗将中的两个高手：张飞与赵云	188
刘阿斗是低能儿吗？	195
马谡与王平	205
魏延的悲剧命运	213
话说姜维	220
三国时代的几位巾幗英豪	228
曹操的影子卡后(228) 孙策、孙权的母亲吴夫人(230) 常使 刘备惴惴不安的孙夫人(231) 两个丑小鸭(233) 辛宪英未卜 先知(236)	
三国时代的“智斗”	238

漫谈“连环计”(238) 李孚的“以假乱真”和“金蝉脱壳”(241)
张辽镇定应变(242) 蒋干的策反活动和黄盖的伪降计(242)
蒋济的“虚张声势”战术(247) 周瑜的美人计(248) 刘备智
取益州(250) 贾诩的“离”字计(253) 吕蒙的“瞒天过海”
计(254) 吕蒙“白衣渡江”始末(255) 诸葛亮计斩孟达(260)
诸葛亮的“七纵七擒”(261) 诸葛亮的“空城计”和文聘的卧
床却敌(264) 吴、魏石亭之战中的“智斗”(265) 孙权和曹睿
的情报与反情报斗争(268) 孙权在“智斗”中遇到了劲敌
(270) 陆逊的“将计就计”(272) 陆逊用“反间计”赶跑了魏
国的江夏太守(273) 司马昭用奇计瓦解寿春守敌(274) 孙
权和王基怎样应付敌人的伪降(277) 姜维复国密谋的失败
(278) 陆抗的“移花接木”计(280)

后记282

张角、张鲁和早期道教 的历史作用

历史上有两种英雄。

一种是代表被压迫生灵的杰出人物，如奴隶起义、农民起义和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一种是代表统治阶级的杰出人物，如历代的开明君主和他们的有所作为的臣属。

东汉末年农民运动的领袖张角属于前一种，倡导五斗米教的张鲁也曾属于这一种。曹操、刘备、孙权则属后一种。

两种人物的历史作用不尽相同，前一种人是真正的英雄，虽然他们往往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和错误，但他们是历史前进车轮的推动者。后一种人的历史作用复杂些，他们往往一身具有进步和反动的双重作用。而且由于历史地位的限制，他们的进步作用也是很有限的。

张角是东汉末年早期道教——太平道的首领。他组织发动的黄巾大起义，敲响了东汉王朝的丧钟，他是受尽凌辱压迫的广大农民反封建大潮的先行者。

张角组织发动的黄巾起义，在宗教的旗帜下聚集了大批为理想而战的农民，范围遍及大半个中国，尽管最后被东汉统治者纠集的地主武装镇压下去，但起义运动沉重打击了腐朽的封建力量，导致了东汉政权的土崩瓦解。倡导五斗米道的张鲁也是早期道教首领。张鲁没有参加和发动黄巾起义，但他在汉中地区建立的政教

合一的政权，是黄巾起义追求的太平社会理想在中国土地上的一种试验，尽管凭美好愿望建立起来的乌托邦理想最终破灭了，但这一和封建统治阶级抗争达三十年之久的太平社会的存在和实践，表现了农民阶级对崇高社会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尽管他们在历史天幕上，如耀眼的彗星一闪而过，但其英雄业绩永垂不朽！

张角和太平道

张角作为黄巾起义领袖和封建统治秩序的破坏者，官修史书没有为他立传。但是这样的英雄人物，其光辉是掩盖不住的。我们在《后汉书》和《三国志》的有关篇章中，还是多少可以看出张角创立太平道和发动黄巾起义的一些基本情况。

从《后汉书·皇甫嵩传》等有关记载看，张角，巨鹿（今河北宁晋县）人，他是太平道的创始人。太平道属于早期道教，主要是民间巫术和黄老哲学相结合的产物。《太平经》是其早期经典。张角以大贤良师的身份，“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持九节杖”，教病人“跪拜首过”，用“符水咒说以疗病”。病人饮符水，“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尽管这种用请祷、饮符水的治病办法只能起心理治疗的作用，但对于饥寒交迫、贫病交加、走投无路的民众，这种心理疗法也是一种精神安慰。太平道以此方式吸收了大批的信徒。

为下层民众解除病痛，消灾免祸，不是太平道的最终目的。张角创立太平道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现实“去乱世、致太平”的理想。为此，他派了大弟子云游四方传道，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后汉书》说：

“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接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

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

由此可见，仅十余年的时间，太平道吸收的信徒已达数十万，其势力范围已经遍布全国八大州郡。在这基础上，张角把四方数十万人编组成为三十六方，每一方都是军事、政治、宗教合一的单位，各方都有首领，接受张角统一领导。张角还在起义前夕，散布各种神秘的预言，以此加强起义者的信心。

一切准备就绪，原定甲子年（公元184年）三月五日京师内外起义军同时并起，但由于起义军叛徒唐周告密，起义被迫提前在二月举行。“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驰救诸方，一时俱起，皆著黄巾为标帜。时人谓之‘黄巾’。”一时间“遐迩动摇，八州并起”，参加起义者就有三十六万人之多。起义军在张角三兄弟的率领下，“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面对声势浩大、席卷全国的黄巾大起义，东汉统治阶级惊恐万分，赶紧“发天下精兵，博选将帅”，并解除党禁，纠集一切可动员的武装力量对各路起义军进行血腥镇压。由于起义军起事仓促，分散作战，加之缺乏军事装备和武装斗争经验，在战斗中处于不利地位。公元189年秋天，以张角兄弟为代表的河北黄巾军主力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被训练有素的地主武装镇压下去了。张角兄弟先后死亡。起义军战死者八万人，被杀戮者十万人。张角也被“剖棺戮尸，传首京师”，表现了封建统治阶级残无人道的疯狂报复。

黄巾起义军的主力部队虽然遭到残酷镇压，但其余部仍在各地此伏彼起，连绵有十余年之久。直到三国时代，各地还有黄巾军的余部在活动。如青州、冀州等地的黄巾军坚持斗争达二十年之久，青州黄巾后来为曹操收容和改编。

黄巾大起义是在宗教旗帜下进行的农民革命运动。早期道教在起义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组织起义过程中,宗教活动是联系民众的纽带,张角利用传教布道的方式,在下层社会作组织联络的工作,不断招收信徒,不断发动群众,终于在十余年时间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革命造反力量。

第二,在起义发动阶段,宗教理想是鼓舞人们犯上作乱的精神支柱。宗教的神秘预言极大地增强了人们的胜利信心。

第三,在起义遭受困难的时候,宗教信仰是激励人们战胜困难、坚持斗争的精神力量。虔诚的道教徒为了维护自己信仰,表现得异乎寻常的顽强,许多人以视死如归的殉道精神,与敌人作拼死斗争。

当然,早期道教在农民运动中表现出来的革命作用并不是宗教教义中所固有的。毋宁说,这种革命作用是饱受封建压迫的农民在实际的反抗斗争中给予宗教的。但是,早期道教之所以能成为农民运动的旗帜,能吸引大批下层民众前仆后继地投入阶级大搏斗中,说明早期道教教义中有符合下层民众的愿望和要求的東西。从张角等人信奉的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的内容来看,确实有不少反映农民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反抗的思想。

“物者,中和之有,使可推行,浮而往来,职当主周穷救急也。”
(《太平经合校》246页)

“或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
(《太平经合校》242页)

“不肯加以周穷救急,令使万家之绝,春无以种,秋无以收,其冤结悉仰呼天,天为之感,地为之动,不助君子周穷救急,为天地之间大不仁人。”(《太平经合校》247页)

《太平经》甚至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领导,说皇帝“少内之钱财”非应为皇帝一人所有,“不知乃万户之委输,皆得衣食与是也。”(《太平经合校》)这就是说,财产是天地所产,应为“万户”所有,而现实生活中“富人囤积居奇,穷人贫无立锥之

地”的现象是不合理的。把这些教义和农民要求财产共有，反对剥削压迫的主张结合起来，并通过教主向教徒们传达，那就可以在感情共鸣的基础上，结合成为一种冲决旧社会罗网的巨大的物质力量，这种力量往往是持续而不可遏止的。对旧的统治秩序有极大的破坏力。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汉行已尽，黄家当立”，黄巾起义的目的就是为了推翻东汉王朝统治，建立农民自己的政权。从起义的结果来看，革命目标没有达到。但我们根据《太平经》的教义，并参照张鲁在汉中建立起来的太平社会的实践，不难看出起义农民试图建立的农民政权的某些特征。一、财产共有，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二、周穷救急，一人有难众人支援。三、废除酷刑，以教育悔改办法维持社会秩序。应当说，在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下，用这些办法是实现不了财产公有、没有剥削的理想社会的。但这并没有影响起义农民为自己的理想而战斗。

尽管起义的目的没有达到，但黄巾军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的斗争过程中摧毁了旧的王朝。存在于东汉后期的“拥有奴婢千群、徒附万计”的豪族地主遭到了致命打击，原来就在各地聚结宗族和宾客的新兴势力，乘东汉王朝岌岌可危之际，或为割据一方，或为图谋自保，努力改善自己同部曲、宾客、佃农的互为依存关系。从而在黄巾起义以后，中国大地上出现了武装割据、分土争雄的局面。这既是对东汉旧的腐败社会结构的否定，也是达到新的统一的过渡。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三国的历史是黄巾开创的。张角作为黄巾起义的领导者，其功不可没。他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人民英雄。

张鲁和天师道

张鲁和张角的情况有相似之处。他是早期道教天师道的首

领。早期天师道又称五斗米道，其宗教性质和太平道基本相同，也是以尊奉黄老，用符水治病，教病人叩头思过等宗教活动为特征。但具体的规则更为复杂一些。如在治病过程中要“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司，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道：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典略》）

关于张鲁和早期天师道的活动，《三国志·魏书·二公孙陶四张传第八》中有如下记载：

“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众。”

从以上所引可知，张鲁不是天师道的创始人。他的祖父张陵在鹄鸣山创立了天师道之后，传给儿子张衡，张衡又传给张鲁。张鲁是张衡的孙子，是天师道的第三代传人。

关于这个谱系，历史上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三张（陵、衡、鲁）只是血亲关系而非传道世系。”（任继愈，《中国道教史》）从宗教谱系上看，是张陵羽化后传于弟子张修，张修又传于张鲁。张陵、张修、张鲁才是传道关系。

由于家谱和教谱的不一致，史书上有把张修和张衡混而为一的说法。如裴松之注引《典略》时说：“臣松之谓张修应是张衡。”既然张修是张鲁之父，父业子传，天经地义，张鲁又何必要杀修“夺其众”？这是说不通的。

但是不管怎样，张鲁取代了张修，成为天师道历史上第三代传人。和其两位前任不同，到张鲁取得教权的时候，他已是又有教权又有地盘的实力派。他利用宗教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建立了政教